

# 中国初期改革前后的编年史与全景图

## ——说《平凡的世界》并论怎样不受潮流裹挟、避免误判、独立看书

为什么广大读书界和专业文学研究圈对《平凡的世界》的读解、评价与接受始终存在难以调和的差异？造成这个似乎难以破解之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主要的诚如“当年毁路遥”的周昌义所说，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集体“创新”的氛围排斥传统的现实主义写法。这个问题后来讨论的比较多，但另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却十分重要的原因始终被忽视了，那就是《平凡的世界》不仅如周昌义所说写得太“慢”，太“啰嗦”，缺乏“悬念”，而且与同时期绝大多数长篇小说相比，《平凡的世界》体量实在太太，其丰富的细节和总体构思都相当复杂，在阅读上容易产生形“易”实“难”的悖论，很难一眼看透。

群像描绘是《平凡的世界》人物关系设置最大的特点，也就是小说的纲领与全局。对《平凡的世界》来说，被作者置于中心地位进行轮流或交叉描写的孙少平、孙少安兄弟固然一直被公认为“主要人物”（其中孙少平又被视为主要人物之中更加主要的人物或曰“中心人物”），但他们作为“主要人物”“中心人物”的重要性显然被过分放大，以至于掩盖了众多“次要人物”群像同样丰富的人生内涵。倘若以作者对孙氏兄弟的塑造为小说的纲领与全局，就会对整部小说形成误判。因此，研究《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要关注“主要人物”，更要研究其地位绝不亚于“主要人物”的人物群像。对人物群像，首先必须采取分类法加以整体把握。《平凡的世界》人物群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青年、干部和农民。由这三大类人物群像而非仅仅由“主要人物”孙氏兄弟入手，才能真正提纲挈领，统揽小说的全局。

### 一、“关于苦难的学说”与“活人的道理”——初期改革前后城乡青年群像

青年问题一直是《平凡的世界》备受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关注的焦点，但如前所述，对青年的关注往往集中于孙氏兄弟，而忽略了包括青年群像在内的更多人物群像的重要性。就《平凡的世界》对青年形象的描写而言，其主要方式也是在相互联系中呈现出包括孙氏兄弟在内的城乡两地各行各业众多青年不同的境遇、成长道路和内心世界。作者力图囊括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经历了整个七十年代的极度贫困、进入八十年代之后迅速成长

起来的青年一代。不可否认，小说主要是通过孙氏兄弟，尤其是通过弟弟孙少平的人生轨迹，逐步牵出“八十年代新一辈”人物群像的。如果单从青年人物群像角度看，小说第一部重心就是少平苦读，第二部重心就是少平“揽工”，第三部重心就是少平下矿井，他的“关于苦难的学说”更是串接这三大叙事重心的一条红线。但《平凡的世界》描写的“八十年代新一辈”不只是孙氏兄弟。作者在孙氏兄弟身上固然着墨甚多，但不少场合也写到他们的缺席和并不活跃。更重要的是，大量青年形象在实际生活和精神情感上并不以孙氏兄弟为中心。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有跟孙氏兄弟不尽相同的对生活的认识。因此，作者不仅千皴万染描绘了孙氏兄弟的善良、坚毅与探求，也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其他青年同样缤纷多彩却绝非孙氏兄弟的翻版的青春之歌。由青年群像所共同组成的青春交响不仅包含着青年人的“励志”，更有超出“励志”之上、与更广大的人群息息相通的“活人的道理”。或许可以说，孙少平“关于苦难的学说”是从更加朴素、深广而含蓄的“活人的道理”中提炼出来的一项内容，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一部分，好像一部交响乐的最强音，但反过来“关于苦难的学说”并不能涵盖“活人的道理”。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孙氏兄弟的精神视野显然不能完全覆盖同样是小说贯穿性人物田润叶“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

### 二、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枢纽——初期改革前后中高层领导干部群像

路遥写领导干部，特点是全面而细致。小说第一部主要写地区及地区以下干部群像，到第二、第三部，省级党政全套班子和若干中央高层领导也频频亮相，由此形成从中央到省、市、地区、县、社和村队层层贯通的党政领导完整体系。各级领导干部是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得以正常运转的枢纽与关键。在以往小说尤其长篇小说中，干部形象并不罕见，但像《平凡的世界》这样力图完整描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成龙配套地系统塑造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群像，至今还是独一无二的创举。近年来“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盛行，官员形象层出不穷，但这些小说写官员，第一缺乏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贯通的系统性，第二缺乏官员在“官场”内外实际工作和生活的丰富细节，尤其缺乏《平凡的世界》以改革和反改革以及如何改革为核心对所有官员的全面透视。都是写官，其实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如果无视或忽略路

遥塑造中高层干部的苦心，就会很容易对《平凡的世界》形成误判，比如认为《平凡的世界》无非就是写农村底层青年的奋发有为，而严重低估路遥对历史政治与官场百态过人的洞察。

### 三、“亲爱的”与“外国人”——初期改革前后农民和基层干部群像

《平凡的世界》大书特书的第三类人物，是初期改革前后黄土高原上的两代农民，中心人物是长期担任双水村大队革委会主任（后改村支书）田福堂，副主任金俊山，田福堂的忠实追随者、大队党支部书记、农田基建队队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主任孙玉亭，第一小队队长孙少安，第二小队队长金俊武。《平凡的世界》写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有三个显著特点。首先，是突出地描写各个历史时期一以贯之的农村家庭成员浓浓的亲情爱意。其次，作者很喜欢把普通中国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比作外国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某些真实的外国人。第三，作者哪怕写农村生活极微小的一隅，也力求写出跟这一隅有普遍联系的中国与世界的某个宏观图景，并见微知著，从微小的一隅感知和预测整个国家和社会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与趋向。《平凡的世界》写农村基层干部，首先是为了演绎基本“国策”如何贯彻到广大农村，其次是以这些活跃分子为抓手，写出广大农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写出若干家庭内部成员的复杂关系与丰富情感，由此展开农村政治、经济、生产、生活和精神文化各方面在改革前后的一幅幅巨大的历史长卷。

此外，路遥特别看重普通农民家庭的亲情爱意，他在描写农民时就有个非常有趣的特点，就是不管人物之间相互称呼，还是叙事者称呼人物，几乎一律要加上前缀词“亲爱的”“我的亲爱的”“我的至亲至爱的”。人物彼此这样称呼对方，并未落在口头，而是作者替人物在心里这样说话。在作者看来，这是他笔下人物真实情感的必然表达，一点也不生硬，只不过在他们实际的语言系统中缺乏与之对应的言辞而已，所以路遥不得不像鲁迅所主张的那样“给他们许多话”。路遥在农民内心称谓语方面的大胆创造，不仅一扫“五四”之后、“新时期”和“新世纪”以来现当代中国小说大量描写家庭成员之间负面情感与语言暴力的那种弥漫性阴霾，而且至少在《平凡的世界》所展示的乡村生活中一举扭转了几千年来中国家庭内部匮乏爱意表达的称谓习惯。同



邵元宝，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2019），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有《鲁迅六讲》《遗珠偶拾》《汉语别史》《小说说小》等，先后获“冯牧文学奖”“唐弢文学奖”“王瑶学术奖”“鲁迅文学奖”。现任中国鲁迅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

时，路遥很少将中高层干部比作虚构或真实的外国人（只有一次将思想消沉、疯狂追求美食的原西县委书记张有智比作法皇路易十四），其独特的“中外联系”手法主要用于对农民、农村基层干部和同样是农民出身的许多青年的描写。

当然，《平凡的世界》毕竟不是社会调查报告，它的有关历史、文化和社会问题百科全书般的“知识”绝非生硬地作为框架包围或支撑着小说故事主体，而是巧妙地穿插于小说故事无比丰富的细节褶皱，在重点刻画三类人物形象——干部、青年、农民暨农村基层干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正因这三类人物始终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作为背景的丰富而准确的社会历史信息也和人物塑造高度融合。惟其如此，《平凡的世界》才真正称得上是中国初期改革前后一幅气势磅礴的编年史式全景图。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熟稔已然的历史，也敏感于未然的历史，尤其对初期改革逐步推行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有相当出色的观察和富于前瞻性的思考。而细读《平凡的世界》，也能够更好地理解路遥当初提出的有关“交叉地带”“重叠交叉”“立体交叉”“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的思考，以及路遥本人对其精神导师柳青创作经验的批判式继承。

（田珂瑜、张斌甲根据讲座录音整理，经作者本人审阅）